

甘肃省新闻出版业“十二五”发展规划重点出版项目

卓新平 杨富学◎主编

中国西北宗教文献

CHINA'S NORTHWEST RELIGIOUS LITERATURE

●●伊斯兰教新疆卷二●●

《中国西北宗教文献》是甘肃省新闻出版业“十二五”发展规划重点出版项目。丛书涵盖了中国西北地区各类宗教的起源、发展、变迁、衰亡和现状，为现代人文科学的研究，尤其是为宗教学、民族学、敦煌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医药学和艺术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详实可靠的文献资料。



读者出版集团

D P G C . L

甘肃民族出版社

CHINA'S NORTHWEST RELIGIOUS LITERATURE

中国西北宗教文献

伊斯兰教新疆卷二



读者出版集团
甘肃民族出版社

目 录

关于穆斯林王朝叶尔羌汗国	李进新(1)
伊斯兰教在维吾尔族中发展的特点	苏北海(10)
关于哈密回王、伊斯兰教以及哈密历史的调查	赵恩儒(24)
回族教派门宦之产生及其在新疆的分布	王孟扬(35)
新疆维吾尔族伊斯兰教派简介	杜绍源(41)
关于新疆回族伊斯兰教主要教派的初步调查	马忠孝(51)
试探元末明代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和发展	田卫疆(58)
玛哈图木·阿杂木世系综考	陈国光(68)
依合瓦尼派及其在新疆的传播	马品彦(84)
伊斯兰教在疏附	樊润赐(99)
三抬派及其在新疆的传播	马品彦(110)
伊斯兰教与 1864 年新疆农民起义	马苏坤(117)
喀什噶尔和卓家族世系	刘正寅(125)
中亚纳合西班牙底教团与我国新疆和卓、西北门宦	陈国光(137)
略论清政府在南疆地区的宗教政策	潘向明(149)
略论伊斯兰化对维吾尔文明的影响	王延星(159)
明代哈密、土鲁番地区回回的成分及伊斯兰教的渗透	刘志扬(166)
论清季新疆与祖国内地伊斯兰教的联系和交往	陈国光(170)
新疆各族青少年信教问题初探	纳比坚·穆哈穆德罕(178)
从新疆伊斯兰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变化看宗教问题的长期性	何炳济(183)
伊玛目·热巴尼对新疆回族伊斯兰教的影响及有关门宦和教派的历史	谭吴铁(188)
木拉德·阿凡提简介	古丽夏(197)
伊斯兰教传入库车考	苏北海(200)
察合台后王与新疆地区伊斯兰教	樊保良(211)
伊斯兰教传入新疆的时间问题	陈国光(217)
论伊斯兰教神秘主义及其在新疆叶尔羌汗国的发展	阿吉·努尔阿吉 宝文安译(225)
伊斯玛仪派对我国塔吉克族的影响	程广廉(242)
泛伊斯兰主义和泛土耳其主义在新疆的兴灭	包尔汉(248)
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产生及其对新疆的渗透与破产	纪大椿(252)
穆斯林文化艺术精神	徐建融(262)
近现代大土耳其主义、大伊斯兰主义在新疆的活动及其危害	苏北海(281)
论回鹘民族对伊斯兰教向新疆传播的历史贡献	孙振玉(289)

论察合台后王皈依伊斯兰教以及新疆地区伊斯兰化的完成	孙振玉(295)
对新疆伊斯兰教教育的历史回溯	陈国光(304)
萨图克布格拉汗与天山地区伊斯兰化的开始	华涛(313)
略论伊斯兰教对维吾尔文化的影响	丁文楼(327)
和卓家族兴起前伊斯兰教派在西域的活动及其政治背景	刘正寅(336)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新疆南部穆斯林起义与维吾尔社会的伊斯兰教	王柯(344)
关于清代新疆伊斯兰教民法问题	陈国光(353)
和卓崇拜的兴衰	潘志平(364)
13-14 世纪西部蒙古汗国伊斯兰化的几个问题	丁明俊(371)
新疆伊宁市回族大寺简史	马玉麟(377)
回鹘伊斯兰教研究综述	刘戈(380)
伊斯兰教传入吐鲁番盆地考	苏北海(389)
乌鲁木齐回族二十三坊	陈国柱(399)
新疆南部维吾尔族地区的瓦合甫制度问题	李进新(404)
伊斯兰建筑艺术巡礼	张俊彦(410)
伊斯兰教与古代新疆文化	陈国光(421)
维吾尔族与伊斯兰教经院教育	夏米西丁·哈吉(430)
准噶尔汗国末年和卓家族的活动与西域形势的演变	刘正寅(433)
穆罕默德·谢里甫及其乌瓦伊西耶教团	陈国光(444)
关于额敏和卓的几个问题	王希隆(457)
伊斯兰文化与维吾尔民间文学	凯赛尔·库尔班(461)
维吾尔族人生礼仪的文化蕴涵与变迁	阿合买提江·艾海提(473)
正确阐明新疆伊斯兰教发展历史	陈国光(494)
当代新疆农村维吾尔族宗教行为分析	蒋丽蕴(504)
奥当麻扎综述	李进新 努尔买买提·托乎提(511)
试论苏非派在新疆回族中的传播	韩中义(518)
国内关于维吾尔族信仰伊斯兰教的研究概述	桑荣(523)

关于穆斯林王朝叶尔羌汗国

宗教研究所 李进新

叶尔羌汗国和“喀喇汗王朝”、“高昌回鹘王国”等一样，是维吾尔族建立的国家，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之一。不同的是，叶尔羌汗国建立在十六世纪以后维吾尔族逐步实现了政治、经济、宗教、语言文字诸方面的统一，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近代维吾尔族。叶尔羌汗国正是近代维吾尔族形成时期的文化体现者。作为维吾尔族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叶尔羌汗国有许多新特点有待研究。主要是由于史料的局限，这个王朝历来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认识也不统一。笔者试就有关问题浅谈几点认识：

一、叶尔羌汗国建立的背景及经过

十六世纪前后，整个中亚的形势发生急剧的变化；一是乌兹别克部迁入河中农业区，取代帖木儿王朝建立了乌兹别克国家（布哈拉汗国、基瓦汗国）；二是被逐出中亚的帖木儿系后裔巴布尔，在印度创建了著名的莫卧儿帝国；三是哈萨克游牧部落联盟的迅速崛起和壮大；四是在乌兹别克、哈萨克、柯尔克孜等部的排挤下，蒙兀儿斯坦的察合台后裔进入南疆农业区建立了新的王朝——叶尔羌汗国。

必须指出，这一时期各民族由于新成份的加入，中亚古代历史上出现了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民族间的融合，并且最终奠定了现代中亚、新疆各民族的基本特征和分布状况。

发生上述一系列变化的根源是来自北部草原民族乌兹别克人的迁徙和战争。乌兹别克部，即汉籍史料之“月即别”，为成吉思汗长子术赤后裔所领金帐汗国之遗部。术赤第五代孙乌兹别克汗（1312—1340年在位）接受伊斯兰教并在部族中推广，以后，“乌兹别克”遂成为该部族的名称。在阿布海尔汗时期（1413—1489年），部分乌兹别克人已迁往河中定居，昔班汗时代乌兹别克部开始大举南迁，占领了锡尔河下游地区。这时撒马尔罕的帖木儿后裔正陷入争夺王位的内乱中，国势大衰，双方都企图借助昔班汗攻灭对手。昔班汗看出这一弱点，乘机入侵河中，于1500年攻陷撒马尔罕，又连下布哈拉、塔什干、费尔干等地。帖木儿后王巴布尔率残众退出河中，在喀布尔称王^①。

乌兹别克人的南迁，使一部分不愿随徙迁往农业区的部众离贰，逃往蒙兀儿斯坦驻牧于楚河流域；其后，陆续又有其他突厥—蒙古游牧部落走依先徙的部族，形成早期哈萨克部落联盟。哈萨克部在巴尔喀什湖至伊犁河流域广大地区得到迅速发展。到十

六世纪初哈萨克汗时代（1509—1518年在位），哈萨克已是拥有100万人口、30万军队的强大部族^④。

与乌兹别克部、哈萨克部的积极扩张相反，东察合台汗国的蒙兀儿部在长期的内战中一再分裂，日趋衰落。其领地蒙兀儿斯坦几乎被乌兹别克、哈萨克、柯尔克孜和准噶尔盆地的瓦拉蒙古部（卡尔梅克人）瓜分殆尽，只剩下很小的一块东部领地——吐鲁番、焉耆地区掌握在察合台后王满速儿汗手中。1509年，在与乌兹别克人的战争中，蒙兀儿汗马黑木和他的六个儿子及其部分蒙兀儿首领全部被昔班汗处死，其部众或降附乌兹别克部，或投奔了哈萨克，东察合台汗国基本瓦解。在外部势力排挤的同时，蒙兀儿人内部的争夺却有增无减。满速儿当权后即对其同胞大加迫害，其兄弟赛德、哈里勒、巴巴叉、艾曼火者、真帖木儿等纷纷逃亡或者据地自守。内争又使蒙兀儿部陷于四分五裂。

叶尔羌汗国的创建者是苏丹赛德汗。他象当时许多失意的王室贵族那样，在流亡生涯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赛德被满速儿逐走后，曾联合在柯尔克孜部称汗的同母弟哈里勒进攻满速儿。兵败后，哈里勒投奔昔班汗被杀，赛德率余部逃进帕米尔山里干起“强盗生涯”^⑤。绝望中他投奔了喀布尔的巴布尔。巴布尔是赛德的姑表兄弟，赛德在喀布尔住了三年。其时，昔班汗在进攻伊朗时被伊斯美尔沙杀死于谋尔夫，乌兹别克部大乱。被逐出喀什噶尔的杜格拉特部酋长异密赛德·穆罕默德·米尔扎（为《拉失德史》作者穆罕默德·海答尔的叔父）乘机攻占安集延，并将这块领土奉送给赛德，巴布尔任命赛德为安集延总督。1511年，阿巴拜克从喀什噶尔率领两万军队进攻安集延，赛德仅以一千五百人的军队击溃阿巴拜克之军。因此赛德声威大振，蒙兀儿旧部纷纷归附^⑥。同年，巴布尔在喜撒儿·沙德曼一地击败乌兹别克军队并将其逐出河中地，巴布尔重登撒马尔罕王位。但几个月后乌兹别克人卷土重来，大败巴布尔与伊斯美尔沙的联军，巴布尔再度逃往喀布尔。1513年，乌兹别克诸汗集结军队向安集延进发。赛德面对强大的对手又失去了靠山，不得不放弃安集延领地打算退入蒙兀儿斯坦。当军队到达哲德干时，赛德召集所部首领举行会议，最后决定放弃返回蒙兀儿斯坦的计划，去夺取南疆六城地区^⑦。

南疆六城——阿尔蒂沙尔，是察合台乌鲁思的另一个重要领地。蒙古统治初期，这块被称为“曼朶赖·苏雅”（向阳地，包括费尔干盆地）的农业地区就已封为杜格拉特部的世袭领地，受制于察合台后王。1480年以后，该部异密阿巴拜克掌握了喀什噶尔统治权，自称苏丹，宣布脱离察合台后王。其统治初期，喀什噶尔诸城较为繁荣，国力也较强大，曾几次打退蒙兀儿汗和撒马尔罕方面的进攻。但他统治后期对人民实行横征暴敛；对属臣及宗亲动辄杀戮，统治十分残暴；引起内部矛盾的激化，陷于众叛亲离、内外交困的虚弱境地。这一点在进攻安集延时为赛德少数军队击溃的那次战争中，已得到充分暴露。

赛德所部人马当时面临的处境是国土丧尽，强敌在后。返回蒙兀儿斯坦意味着要与哈萨克、柯尔克孜等部为邻，继续在草原上过流寇生活，前途不可想象；而转入南疆农业区，尽管为蒙兀儿人世代所反对，但虚弱的南疆政权无疑给这部分蒙兀儿人创造了重建基业的大好时机。因此哲德干会议作出夺取喀什噶尔诸地的选泽是十分重要和明智的。

回历920年春（公元1513年底），赛德率领所部近5000人进抵阿图什。经过激战，连克喀什噶尔、英吉沙、阿克苏、叶尔羌和于阕。阿巴拜克在逃往拉达克山途中被俘杀。这一年的拉扎波月（1514年5—6月）赛德在喀什噶尔登上白毡铺地的高台，宣布即位。不久将统治中心移往叶尔羌城，叶尔羌汗国由此诞生。

二、统治概况

叶尔羌汗国从1514年始建，至1682年白山派首领阿帕克和卓借助噶尔丹之准噶尔部占领叶尔羌废伊斯玛义汗⁸，约历十一世君主，统治168年。

赛德汗建国之初，推行领土扩张和积极的对外政策，除本境六城地区外，还控制了巴达合伤、费尔干和瓦罕地区的统治权；七河一带的哈萨克部和伊塞克湖周围的柯尔克孜部慑于赛德汗的威力，都臣服于叶尔羌汗国。赛德汗还以“圣战”的名义数次出兵远征拉达克（今克什米尔）、博乐尔（巴基斯坦北境）和乌思藏（西藏地区）。这些战争纯属掠夺性质，终因山高路远、气候恶劣又粮草不济而毫无建树。

1516年，赛德汗为了巩固新政权，对占据着吐鲁番地区的满速儿汗采取主动的友好姿态与之和解。通过宗教人士的周旋，双方在阿克苏与库车之间的边界上会晤。赛德在名义上作出重大让步，包括承认满速儿居“大汗”之位，以其名铸造钱币并在朗诵虎士白时首念满速儿之名等。为此，两国达成维持原状、互不侵犯、友好交往的协议，为叶尔羌汗国和天山以南整个地区创造了一个和平安宁的局面⁹。这是赛德汗外交政策上的一次重大胜利。

1533年赛德汗死于远征拉达克山途中，其子阿布都·拉失德汗继位。他即位后，为了加强王权，打击权势日重的杜格拉特部家族，首先处死了前朝宰相赛德·穆罕默德·米尔扎，指控其密谋废汗另立，并对其家族成员进行镇压¹⁰。历史家穆罕默德·海答儿这期间不得不流亡在拉达克。满速儿汗闻知赛德汗的死讯，曾举兵来犯，被拉失德汗击退。在对外方面，拉失德汗也一反赛德朝的前约，与宿敌乌兹别克人结盟，攻打原先的盟友哈萨克部。同时又继续对博乐尔等地进行掠夺性圣战，用征服城堡的土在叶尔羌建起一座象征圣战胜利的建筑物。¹¹拉失德和赛德两朝圣尽管对外用兵频繁，但由于放宽了对农民和手工业者、商人的剥削，经常开放国库赈济贫民，因此国内较为安宁，出现了经济、文化繁荣的景象。

拉失德汗死于1559年，遗有十三个儿子，其中二子阿布都·克里木继承汗位。兄弟之间为争夺汗位展开斗争，其弟库列依什苏丹夺位失败后逃往印度。吐鲁番方面从1570年满速儿之子沙汗死后，汗位无嗣，克里木汗控制了吐鲁番地区。克里木朝时，和卓伊斯哈克从中亚来到叶尔羌。

1591年阿布都·克里木死去，拉失德汗之第五子穆罕默德汗继位。第十三子阿布都·拉西木最初被任命为吐鲁番的阿奇木，后来他脱离叶尔羌政权自立为汗，统治吐鲁番地区近半个世纪。他治理下的吐鲁番较前朝繁荣强大¹²，准噶尔部和哈萨克一部分臣服了他，叶尔羌政权则长期受其困扰。

穆罕默德汗时期，西方基督教耶稣会神甫鄂本都曾游历叶尔羌诸城。这是叶尔羌汗国时期唯一留下记载的外国旅行家游历新疆南部地区¹³。

1609年穆罕默德汗死后，统治集团内讧不断，割据倾向严重，与哈萨克、柯尔克孜、准噶尔等部的战事愈加频繁；同时不断受到吐鲁番拉西木汗的袭击，汗国逐步走向衰退。特别是和卓势力开始越来越多地干预朝政，汗权日益受到和卓的操纵。

穆罕默德汗以后相继在位的叶尔羌汗是：穆罕默德子术扎丁·阿合买德汗1609—1618年在位；1618年羽奴思苏丹之子库列益什苏丹发动政变杀死阿合买德汗，但上台仅九天即被阿巴克汗杀死；阿合买德子阿布都·拉提甫（阿巴克汗）1618—1630年在位；阿巴克汗子苏丹阿合买德（夫拉德汗）1630—1632年在位；夫拉德之弟苏丹马合木德（克雷奇汗）1632—1635年在位；1635—1638年夫拉德汗复位。

1638年前，阿布都·拉西木已去世，其长子阿布都拉继承吐鲁番汗位。他挫败了岳父奥布哈迪米尔扎的篡权阴谋，乘叶尔羌内部混乱之际，勾结叶尔羌宗教首领和卓夏迪，先后夺取阿克苏和喀什噶尔。夫拉德汗被逼退位，放弃叶尔羌城逃往巴里黑。阿布都拉在和卓夏迪和封建贵族的拥戴下入主叶尔羌。阿布都拉在位三十年，政绩颇著，武功显赫，是叶尔羌汗国“中兴之主”。这期间，汗国比赛德朝时更为强大，天山以南全部统一在叶尔羌政权之下，吐鲁番地区成为汗国的一个行政区，国内政令统一，较为安定。阿布都拉多次对外用兵，迫使柯尔克孜和哈萨克部重新归附叶尔羌，准噶尔部也与之订立了和约；汗越过帕米尔重新征服博乐尔等地，并两次出兵河中，攻陷安集延。阿布都拉汗的威名一时震动了中亚各国^[1]。同时，叶尔羌汗国首次与清朝建立了通使通贡的关系。但其晚年重蹈阿巴拜克复辙，遭到其子尧乐巴斯和白山派首领尤素甫、阿帕克父子的联合反对。阿布都拉汗无力抵御，遂取道印度去麦加朝圣，政权落入尧乐巴斯手中。两年后尧乐巴斯被人暗杀。阿布都拉西木之四子伊斯玛义夺取汗位。

伊斯玛义统治叶尔羌将近十二年，这时的叶尔羌汗国已四分五裂，汗仅仅控制着叶尔羌和喀什噶尔之地。同时，和卓的权势已对王权构成严重威胁。伊斯玛义企图以驱逐白山派首领阿帕克和卓，扶植黑山派势力维持自己的统治。阿帕克和卓被逐出南疆后过了十年流亡生活，后来他取得西藏达赖五世的支持，借用准噶尔部军队返回南疆。1682年准噶尔部首领博硕克图·噶尔丹轻而易举地占领喀什噶尔，伊斯玛义被俘虏解往伊犁。噶尔丹扶植阿帕克和卓为新疆南部的统治者，叶尔羌汗国遂告灭亡。

三、政权性质

叶尔羌汗国的统治者是突厥—维吾尔化的察合台系蒙古后裔。察合台后裔从十三世纪蒙古统治新疆、中亚，到十四世纪中叶秃黑鲁帖木儿的东部察合台汗国，及于十六世纪的叶儿羌汗国，一直是作为成吉思汗“黄金氏族”的成员享有新疆最高统治者的地位。三百多年间，这支汗族及所领蒙古诸部同当地维吾尔文化习俗相融合，渐染伊斯兰教，因而在建立叶尔羌汗国后，其政权的特点是在采用伊斯兰教国体的同时，残留着部分蒙古—突厥游牧国家的统治习惯。

叶尔羌汗国是封建专制世袭制，可汗享有神圣的权力。但氏族宗法观念仍残留在统治集团中，汗与本氏族成员之间仍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平等关系；国家被视为整个汗族的财产。从这一观念出发，可汗将领地授封于自己氏族的成员。封地主要以城市

为中心的行政区域。但由于国土狭小，不能满足诸宗王的需求，特别是以氏族宗法制为依据的领地分封，往往使汗不能节制各封建宗王，造成统治集团内部频繁发生政变、夺位、谋反等现象。如果说这种分封在初期对巩固汗权尚有一定作用，那么以后却愈加造成割据的加强和汗权削弱。到汗国后期，汗的地位的虚弱程度甚至达到需要依靠宗教上层来勉强维持。

统治集团除王室以外主要有三种势力：第一是汗统领下的蒙兀儿诸部及其首领。据穆罕默德·海答儿说，这部分蒙兀儿人在汗国初期，尚有三万人左右分别居住在喀什噶尔和吐鲁番^⑤。显然这是最后一批尚未完全融合于维吾尔族中的蒙古后裔，他们刚刚从蒙兀儿斯坦牧区进入南疆诸绿洲，而大部分蒙兀儿人已和维吾尔族融为一体或加入其他游牧民族^⑥。叶尔羌汗国的蒙兀儿人主要是赛德汗流亡期间陆续集结的旧部。计有杜格拉特、杜赫吐伊、巴鲁拉思、扎刺思、翰耳朵、牙儿克、伊塔儿奇、昆奇、伯格切克、麦盖提等十部^⑦。这些氏族的首领（异密）构成汗国的官僚阶层和封建领主，汗委任他们为宰相、各级官员（伯克）、各城阿奇木和军队各级长官。其次是伊斯兰教宗教界，其代表人物和卓主要是充当汗和诸宗王、封建主的宗教导师——哈里发。宗教界通过清寺、麻扎和教经堂的瓦合甫，拥有大量地产和农奴，成为宗教—封建主阶层。宗教界控制着全体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第三个阶层是当地的封建地主。汗依靠这三个阶层建立起封建世俗统治的体系。

在这种世俗统治体系中，蒙古游牧国家的某些传统自然地保留了下来，并纳入伊斯兰教的国家观念中。据穆罕默德·海答儿所述，叶尔羌汗国的居民分为四等，1、上绵：农民；2、可陈；军队；3、艾玛克：游牧民（他们有取得一定数量的谷物、纺织品等等的权力）；4、官员和宗教人士的阶级^⑧。其中可陈（qaucin）和艾玛克（ayimag）的成员主要是蒙兀儿人。可陈原是察合台蒙古中的一个重要氏族名称，同时它“也是军队中享有特权的那一部分人，即汗自己的千人团（近卫军）的名称”^⑨。这是蒙古帝国时期的军事组织形式之一。艾玛克的蒙语意义是“集会，任何一种相近事物的结合”，据苏联蒙古学学者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解释：“在中世纪的蒙古，游牧于同一地区的同族阿寅勒集团被称为爱马克，爱马克乃是部落分支，更正确些说，就是胞族。”也就是说，彼此有亲族关系的民族集团、家族或民族的联盟^⑩。后来在蒙兀儿人中，艾玛克演变为游牧人的集团，成为叶尔羌汗国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除了有权获取必要的生活物品以外，还享有相当多的自由。他们“不向国王纳税，因为当国王号召的时候，他们要为他而去参战”^⑪。可陈和艾玛克一起构成了国家统治力量的支柱。可陈是汗的一支常规军队，艾玛克则是军事力量的补充，两者的地位都在上绵——农民之上。上绵（tümen）一词是从喀什噶尔原始居民的语言转为突厥语表示“众多”的含意，蒙古人曾借用来表示大的部落集团“万户、万人军团”^⑫，以后则更常用以表示有关的定居居民^⑬。南疆诸绿洲是早已封建化的农耕经济区，农民是主要的社会生产者和被统治阶级。在叶尔羌汗国，农民除遭受封建地主，官僚阶级、宗教上层的多重压迫和剥削以外，还多少受到游牧贵族统治式的野蛮掠夺。

在叶尔羌汗国境内，除伊斯兰教外没有其他任何宗教存在。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从国王到所有臣民都是伊斯兰教的信仰者。伊斯兰教法（沙里阿特）普遍适用于国家的法律、道德准则，人际关系以及世俗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教律方面

主要是遵行大伊麻目派，即逊尼派中的哈乃斐派^①。在汗国后期，随着和卓影响的扩大，苏菲派神秘主义得到迅猛发展。首都叶尔羌和喀什噶尔，苏菲派成为伊斯兰教中占支配地位的派系。这期间，宗教对社会的影响是相当广泛深刻的，并且宗教对政治的干预也十分严重。但这并不说明叶尔羌汗国是“政教合一”的政权形式^②。事实上，叶尔羌汗国恰恰是实行政教分离的政策，宗教不能参与朝政。宗教界的主要作用是辅助统治者维持国家秩序，行政、军队及税收等掌握在世俗方面。关于这一点，在十七—十九世纪维吾尔手抄本历史文献中都有明确记述。其中一条特别提到：阿布都·克里木朝时，汗每个星期一和星期五亲自出朝理政，“他的一侧坐着喀孜（宗教法官）和穆夫提（教法解释者），另一侧坐着宰相和阿奇木；与伊斯兰法有关的案件由喀孜和穆夫提处理，涉及习惯法范围之内的事情，则由以宰相为首的诸异密去处理。”^③这里明确地提到了政权与教权的分离及其司职范围。这种形式基本上维持到最后由和卓建立的政教合一政权为止。

以上事实说明，叶尔羌汗国与同时代建立的莫卧儿王朝、乌兹别克汗国以及前期的帖木儿王朝等一样，是突厥化、伊斯兰化的蒙古后裔建立的一系列王朝之一，属于伊斯兰教的世俗王朝。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许多穆斯林学者的著述中仍然称叶尔羌政权为“蒙兀儿国”或者“蒙古利亚国”。尽管这种提法不一定准确，但多少反映了这个政权的某些特点。

四、叶尔羌汗国的和卓问题

从十七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和卓成为新疆南部政治舞台的主要角色。和卓建立了维吾尔族历史上唯一一个伊斯兰教政教合一的独裁政权；以和卓为中心的黑山派、白山派之争，也是新疆伊斯兰教历史上唯一因派系不同而发生的长期大规模流血冲突；清朝统一新疆后，又多次爆发和卓后裔掀起的叛乱活动。和卓成为社会动乱的不良因素。其实，和卓并不属于新疆任何一个民族的产物，而是随同伊斯兰教从中亚的引入而带来的副产品。它既不代表伊斯兰文化，也不代表维吾尔民族传统；恰恰相反，它是麻醉民族精神的一剂毒品，是导致十七、十八世纪维吾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普遍衰退的主要因素之一。和卓势力的兴衰乃是维吾尔民族历史的一幕悲剧。

和卓势力兴起的阶段是在叶尔羌汗国，换言之，叶尔羌汗国是和卓势力得以滋生、繁衍的温床。这是有其社会根源和政治背景的。

新疆的和卓基本上是来自中亚。和卓自称是先知后裔，以传播苏菲派神秘主义为宗旨，建立各种教团，发展门徒。中亚是苏菲派流行较早并且是许多重要教团的诞生之地。伊斯兰教从阿拉伯传入中亚又依次传入新疆，从此中亚和新疆的联系更为紧密。特别是十五世纪以后，海路贸易的发展和中西陆路交通的衰落，使亚洲腹地逐渐变为封闭式的社会，新疆伊斯兰教更加受到中亚的影响和控制。这一点特别表现在苏菲教团从中亚的渗入。苏菲派既带来了神秘主义思潮，又引进了和卓。十四世纪中叶产生于布哈拉的纳合西班牙迪教团，很快发展为中亚最有影响的苏菲派势力。至少在十五世纪初“纳合西班牙迪耶”就已传入新疆境内^④。叶尔羌汗国初期，纳合西班牙迪耶第五代教主和卓买合杜木·艾扎木从布哈拉访问叶尔羌诸城，“后来他返回中亚，公元

1542年卒于撒马尔罕”，他被新疆穆斯林“号称为传播神秘主义的导师”^⑧。几十年以后，其庶子伊斯哈克外里重返叶儿羌，受到统治者阿布都·克里木汗和穆罕默德汗的推崇^⑨，从此定居于喀什噶尔。1620年，买合杜木·艾扎木嫡长子穆罕默德伊敏（尊号伊禅卡朗）的儿子穆罕默德·玉素甫又从中亚来到喀什噶尔，得到阿布都·拉提甫汗的支持^⑩。自从这两支和卓先后来到新疆以后，便立即形成了以黑山派、白山派为标志的不同教派，垄断了伊斯兰教的领导地位。由于这两支家族同属于一个祖先——买合杜木·艾扎木，又同以喀什噶尔为传教据点，因此，被统称为喀什噶尔和卓家族。尽管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这些和卓后裔融进了维吾尔族，但其祖先是来自中亚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其他和卓的情况也是完全如此。

和卓势力的发展与察合台后王统治者的盲目推崇和扶植是分不开的，几乎从察合台后王皈依伊斯兰教开始，便与和卓结成了政治——宗教的联盟。这种联盟看来是世俗统治者建立对伊斯兰教徒统治不可缺少的一种手段。早在十四世纪时，秃黑鲁帖木儿就和他的信仰领路人、祖籍为布哈拉的和卓后裔额什丁首建了这种联盟。在以后近两个世纪内，东察合台汗国统治者与额什丁和卓家族的这种联盟关系一直维持下来。叶尔羌汗国建立后，中止了这个联盟，额什丁家族依附于满速儿的吐鲁番政权并很快衰落下去。叶尔羌统治者为了巩固对穆斯林群众的统治，又从中亚物色新的宗教盟友，重新建立政治——宗教的联盟。于是对和卓的推崇和渲染达到空前的高度。例如，赛德即汗位后，邀请费尔干纳的和卓穆罕默德·优素甫来叶尔羌，自称是他的门徒，对他的话奉若神明；优素甫死后，赛德又成为其兄华万德·马赫木德的门徒，“凡在宗教上所欲企求的，都如愿以偿”^⑪。阿布都·拉失德在位时，邀请流浪在坎巨特的苏菲派依禅穆罕默德，谢日夫来叶尔羌并带头作了他的门徒。据史料说：“阿布杜热西德汗为和卓·穆罕默德·谢日夫举行了十天宴会，以示尊重。和卓在百姓中有了威望。和卓·穆罕默德·谢日夫告辞了阿布杜热西德汗去喀什噶尔朝拜苏图克·布格拉汗麻扎时，喀什噶尔城的百姓听说阿布杜热西德汗作了和卓的信徒，他们也都作了和卓的信徒。和卓·穆罕默德·谢日夫在阿图什的麦西赫德（指苏图克·布格拉汗麻扎）隐居了七年，这期间，阿布杜热西德汗曾亲赴该地拜访和卓。”^⑫叶尔羌统治者甚至用这样的诗句悼念一个死去和卓的亡魂：

缺了你这朵花呀，这世界就不成其为是我的花园。

离开了你呀，我心中的王国就失去了苏勒坦。

在政治上吹捧的同时，统治者还从经济上给予大力扶植。几乎每个中亚来的和卓都能分享到一份封地，既作为他们传经布道的场所，又作为享受食禄的采邑。使他们成为宗教——封建领主。毫无疑问，统治者的推崇和扶植在一般穆斯林群众中大大抬高了和卓的身份和威信，使和卓势力得以迅速膨胀。

还有一个不应忽视的方面是叶尔羌汗国时期经济状况和社会民情的衰落趋向。主要表现为在封闭型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农业经济受到封建主、宗教主的严重阻碍，农民负担过重，而统治阶级的贪婪欲望并无止境；商业同样受到封闭的限制，对外贸易时常停顿并且仅仅在中亚、印度这样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进行。经济上的贫穷落后直接造成了人民精神生活的贫乏和愚昧。这就为和卓传播苏菲主义、宣传圣徒崇拜、陵墓崇拜和相信奇迹等迷信思想创造了群众基础。此外，保留在维吾尔族中间的

一些萨满教、祆教、摩尼教和佛教等宗教的残余影响以及落后习俗,被和卓们巧妙吸收到苏菲主义体系中;对各种自然物、灵异、诸神、祖先,甚至对真主安拉的崇拜演变为对和卓个人的崇拜,和卓具有了“神”的身份。如和卓自己所声称的:“我是真主,我是天仙,我是引路人……”,而信徒们则奉行着“畏主就是畏您”^①这样的信条。和卓被捧上如此高的地位,他们有夺取世俗权力的野心也就不足为奇了。

总之,叶尔羌汗国以及和卓时期,由于和卓的影响和操纵,伊斯兰教蒙上了浓厚的迷信色彩。正如凡伯瑞指出的:这一时期“中亚细亚伊斯兰教的总的特征是:严格遵守夏利亚特(伊斯兰法一译者),明显地存在着教派、托钵僧和圣人崇拜;混有游牧的突厥人的因素,是狂信神秘主义的,和西亚细亚相比,它的伊斯兰体系是保守的、停滞的”^②。伊莱亚斯也认为:“概括地说,和卓是蒙兀儿诸汗统治期间因袭旧势力而发展起来的阶层,而蒙兀儿诸汗的统治则以肆无忌惮、任性妄为的游牧民的入侵开始,以伪善和宗教狂热告终——出现后两种情况就标志着—一个民族绝对无法达到任何程度的文明了。”^③

注释:

- ① 巴托尔德著,罗致平译《中亚突厥史十二讲》,181页。
- ② 珀西·塞克斯著,张家麟译,《阿富汗史》第一卷下册,467页。
- ③ 《新疆简史》上册,212页。
- ④ 穆罕默德·海答儿著,《拉失德史》,即汉译本《中亚蒙兀儿史》第一编,336页。
- ⑤ 同上,353页。
- ⑥ ⑭、⑮、⑯、⑰、⑱、⑳、均见马合木德·扎刺思著《编年史》(波斯文)汉译稿名《拉失德史续编》,原新疆民研所何锐翻译。
- ⑦ 《中亚蒙兀儿史》第一编,355页。
- ⑧ 关于叶尔羌汗国灭亡的年代,诸说不一。大致有1678年(瓦里汗诺夫),1679年(比丘林)、1683年(一位俄国被俘军官)和1682年(巴托尔德)等几种说法,据统治年表得知,伊斯玛义汗即位于1670年,统治叶尔羌约十二年,由此推算出1682年的说法更近乎事实。详见《巴托尔德文集》第八卷,186页,《出使土耳其斯坦的报告》。
- ⑨ 《中亚蒙兀儿史》第一编,356页。
- ⑩ 《巴托尔德文集》第八卷,174页,《出使土耳其斯坦的报告》。
- ⑪ 关于鄂本都的游历记载,见何高济等合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下册,541—567页。
- ⑫ 《中亚蒙兀儿史》第一编,376页。
- ⑬ 在哈萨克族大玉兹中即有名称为“杜拉提”的部落。见《巴托尔德文集》第五卷,533页,《杜格拉特》。
- ⑭ 转引自《中亚突厥史十二讲》,222页。原文《中亚蒙兀儿史》第二编,215页。
- ⑮ ⑰、⑱、同上《中亚突厥史十二讲》。

- 20 符拉基米尔佐夫著、刘荣峻译，《蒙古社会制度史》，213页。
- 21 同上，271页。
- 22 佐口透著，凌颂纯译，《18—19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下，643页。
- 23 见刘志霄著，《维吾尔族历史》上编，309页。
- 24 史料见马合木德·扎刺思《拉失德续编》，佚名作者的《喀什噶尔史》，巴托尔德在《出使土耳其斯坦的报告》一文中转引了这条史料及波斯文原文，见第八卷、175页。
- 25 1418年即位的蒙兀儿汗歪思后来成为和卓巴哈乌丁，纳合西班牙迪的弟子马黑麻·卡沙尼的门徒。见《中亚蒙兀儿史》第一编，249页。
- 26 见阿吉·奴尔阿吉，《论伊斯兰教神秘主义（苏菲主义）的形成、传播及其本质》原文载《新疆社会科学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七期。
- 27 《巴托尔德文集》第八卷，177页，《出使土耳其斯坦的报告》。
- 28 见安瓦尔·巴依图尔，《略论阿帕克和卓》，载《民族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五期。
- 29 刘志霄著，《维吾尔族历史》上篇，417页。
- 30 见新疆宗教研究所翻译《大和卓传》，83页，（《新疆宗教研究资料》第十二辑）。
- 31 佐口透著、凌颂纯译，《18—19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下，643页。
- 32 伊莱亚斯为英译本《拉失德史》所写的绪论，见《中亚蒙兀儿史》第一编，141页。

（原载《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第3期）

伊斯兰教在维吾尔族中发展的特点

苏 北 海

维吾尔族从十世纪中叶起开始信仰伊斯兰教是维吾尔族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维吾尔族的政治、经济、生活各方面都受到伊斯兰教的深刻影响。当伊斯兰教与维吾尔族原有历史结合后，就使维吾尔族中的清真寺、麻札、瓦克夫地等都形成了与其他民族不同的特点，而近现代一小撮分裂主义者却利用伊斯兰教这一特点，勾结帝国主义者，在新疆地区进行了一系列叛乱活动。

作者苏北海，1917年生，新疆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维吾尔族信仰伊斯兰教经过

从九世纪末叶起，在中亚建立起来的，直至1212年灭亡的喀拉汗王朝，是以维吾尔族为首各族人民建立起来的，为新疆、中亚历史上十分重要的王朝。其重要性不仅因为他自认是“东方和中国之王”；同时在这一时期是中亚社会经济得到重要发展，科学文化取得辉煌成就的时代；另还突出地反映了汗国境内的主体民族——维吾尔族改信了伊斯兰教，从此时起维吾尔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都深刻受着伊斯兰教的影响。

原来维吾尔族在古代信仰萨满教，进入阶级社会后，逐步信仰了佛教、摩尼教、景教，可是从公元七世纪起伊斯兰教兴起于阿拉伯半岛后，随着阿拉伯政治势力的向东扩张，维吾尔族也从十世纪中叶开始信仰了伊斯兰教，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终于全民族信仰了伊斯兰教。

喀拉汗朝并不是一开始就信仰伊斯兰教的，当九世纪末驻恒逻斯的副王奥古勒恰克、卡狄儿汗受到波斯萨曼王依斯马衣勒的进攻并被俘去可敦以下一万五千人以后，才被迫迁都喀什，于是从萨曼朝逃来的一些伊斯兰教徒的宣传，特别是萨曼朝的一个王子，住在喀什附近的阿图什，对喀拉汗朝汗族的信仰伊斯兰教颇多影响。于是奥古勒恰克之侄沙土克·布格拉汗才首先皈依伊斯兰教，然后和其伯父斗争，并取得胜利，接着又战胜了巴拉沙衮的大汗，逐步使喀拉汗王朝统一在伊斯兰教的势力之下。

关于布格拉汗开始信仰伊斯兰教的情况，在维吾尔族民间还有这样一段传说：“沙托克原名大伦布格拉汗，浑名大伦。十五岁出外打猎，碰见一批商队，打开货包，正当他看货时，商队中忽有一人喊礼拜，大伦非常奇怪地问，这是什么宗教，后来他就信仰了这一教。”^①虽然这是一个传说，但却暴露了阿拉伯的传教士大都是充作商人进行宣传的。也正以商品来打动王公贵族阶级的心，从而王公们首先信奉了伊斯兰教，于是就

^①《布格拉汗传》，维吾尔文手抄本。

利用他们的封建权力，强力进行伊斯兰教的宣传。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阿西尔所说，于公元960年(回历349年)西域有一个很大信仰的改变，正是指的伊斯兰教在维吾尔族中已经生根发芽，改变了基本的态势，喀拉汗王朝以沙托克·布格拉汗为首的统治集团已经形成，伊斯兰教就可凭藉政治权力推进了。

于是沙托克·布格拉汗就利用权力，首先促使王公贵族阶级信奉伊斯兰教，同时派人向人民宣传伊斯兰教。不过人民对佛教的信仰是根深蒂固的，当面说信仰了，等传教士一走，却又不信仰了。所以到了沙托克·布格拉汗的儿子阿布勒·哈桑时，就直接用兵力进攻疏勒，压迫佛教徒，强使改信伊斯兰教，于田王贾克鲁克耳哈鲁闻讯，立刻出兵协助疏勒的佛教徒反攻伊斯兰教军队，未得胜利，就只好带着疏勒逃出来的一部分佛教徒退回于田。从此，喀什就成了伊斯兰教在塔里木盆地的根据地。

于田王退回和田后，一方面积极联络同教的吐番、高昌回鹘；一方面还屡派善名、善德、吉祥等僧侣充当使节去中原，请求救助，以进攻喀什的伊斯兰教徒。因此十世纪中叶以后，从木沙·本·阿不达克里木起即已向和田佛教徒开始战争，双方都牺牲很重，到玉素普·卡狄尔汗时，更“以四万军队攻和田，围二十四年之久。”^①和佛教徒联军在和田进行了决战。那时吐番、回鹘都因同信佛教关系，也迅速出兵援助和田的佛教徒，最后佛教徒联军终于失败，和田人民也被迫信奉了伊斯兰教，并归入了喀拉汗朝的疆域，斯坦因在《古代和田》一书中也指明：“由威海至喀什噶尔，在十世纪后半叶时为沙托克·布格拉汗所领有。汗信伊斯兰教……西元1006年后，于田亦在喀什噶尔及巴拉沙衮的……统治之下。”

从中亚直到于田的广大疆域内被喀拉汗朝利用伊斯兰教力量得到统一后，就在维吾尔文化原有的基础上，既吸收了汉族的文化，又吸收了阿拉伯伊朗的文化，在政治比较安定的情况下，一面发展了生产，农业、牧业和手工业都有所发展；同时也开设了各级伊斯兰教学校，建立和充实了图书馆；奖励科学文化，从而产生了不少著名于中外的大学者，如玉素普·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马合木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词典》等都是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不可朽名著，是研究新疆、中亚历史、语言、文学等主要典籍。那时喀拉汗朝文化的发达和影响的深远，诚如《突厥语大词典》的“前言”所说的“喀拉汗朝所发扬的维吾尔语言、文学和文化，对突厥人民的语言、文学和文化起了示范作用。”

在公元1131年后西辽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伊斯兰教还是有所发展的，只是到了1211年被乃蛮屈出律篡位后的八年中，伊斯兰教徒才受到了残酷压迫。屈出律妄图采取极端高压政策，迫令和田人民宣誓，舍弃伊斯兰教，任选景教、佛教信仰一种，并立即在一广场召集不同宗教的教民大会，屈出律强调景教教义的完善，却遭到伊斯兰教徒的强烈反对，不少教徒虽遭到监禁和杀害，仍无所畏惧。可知伊斯兰教已深入喀拉汗朝的维吾尔人民心中，再也无法改变他们的信仰。由于高昌回鹘汗国那时虽仍信佛教，但最后终于都信仰了伊斯兰教，从而到十六世纪时西域的维吾尔族已全部信仰了伊斯兰教。

历史发展到喀拉汗朝为什么一定要摒除佛教、景教、摩尼教等信仰而改信伊斯兰教

^①斯坦因：《古代和田》。

呢？这是由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因为从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已由盛转衰，在西域已成为吐蕃、回鹘、葛逻禄几族互争雄长的地区，特别是在塔里木盆地南部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一带近百年受吐蕃奴隶主贵族的残暴统治，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从九世纪末起建立喀拉汗王朝后，社会仍然动荡不定，并处于萨曼朝的威胁之中，喀拉汗朝统治阶级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必须借助新的宗教以稳定社会和巩固统治。此时适逢咄咄迫人的伊斯兰教势力向东伸展，于是喀拉汗朝的统治者在探悉伊斯兰教的底细后，觉得正适合于社会经济的需要，而毅然带头改信伊斯兰教，并向人民强迫推行，诚如恩格斯所说：“伊斯兰这种宗教是适合于东方人的，特别是适合于阿拉伯人的，也就是说一方面适合于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的市民，另一方面也适合于贝都因游牧民族。”^①而喀拉汗王朝境内从维吾尔族为首的各族人民正是处于东西丝绸通道上，不少从事商业贸易和手工业，而从事农牧业的人民，又都处于亚洲广袤的沙漠和干旱地区，他们“是依靠人工灌溉的农业经济和家长制的村社，构成了东方专制制度的坚固基础，使人们的思想因循守旧，局限在最窄狭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的工具，和传统规则的奴隶。”^②

原来盛极一时的高昌回鹘，主要是信奉佛教和摩尼教，曾和喀拉汗王朝并立于中亚地区，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两个割据王朝，都给中国和世界历史作出过重要贡献，可是高昌回鹘境内的维吾尔族最后也终于屏弃佛教而信仰了伊斯兰教，这也是由于高昌回鹘地区社会经济的需要所促成的。因为在成吉思汗蒙古征讨西辽的过程中，天山南北地区已遭受很严重的破坏。到1260年成吉思汗孙忽必烈称帝，改称元朝后，遭到了其弟阿里不哥和窝阔台之孙海都及察合台后裔笃哇的反对，掀起一场大叛乱，战争前后延续了四十多年。1275年高昌故城火州受到笃哇十二万大军围攻达半年之久，从而使历史上十分繁华的名城，成为废墟一片，后来高昌亦都护火赤哈儿的兵虽仍受元廷命令返回原地，但行至哈密时，仍被察合台后裔笃哇围攻，战死沙场。因而吐鲁蕃、哈密地区在久经战乱之余，田园荒芜，居民流离失所，加之天灾连年不断，饿殍载途，人民生活极端困苦，佛教寺庙经济也遭到了破坏，佛教僧侣也再无法宝可以普渡众生，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们，在现实世界里找不到出路，便只有在新的宗教领域里寻找精神力量和精神安慰，这样就给伊斯兰教在高昌回鹘境内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就在这样的社会经济需求下，高昌回鹘境内的维吾尔族也终于全部信仰了伊斯兰教。

二、清真寺和麻扎在维吾尔族中的分布及其特点

任何一个宗教都有一定的形式来巩固它的信仰，因而穆罕默德于阿拉伯半岛创造伊斯兰教后，就规定每个伊斯兰教徒必需遵守“念、礼、斋、课、朝”五项“天命”。其中“念”是表白信仰，必须在礼拜时不断的念“除真主外，别无他神，穆罕默德是真主

^①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26页。

^②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载《马克思、恩格斯论殖民主义》。

的使者。”而“礼”这项功课须在清真寺内进行，其他的就不须在清真寺内履行。《古兰经》内特别强调“礼”必须按时完成，每一个穆斯林每天要作五次礼拜，即晨礼、晌礼、晡礼、昏礼、宵礼，要求在清真寺内集体完成，在特殊情况下也可在家或其他地点单独履行，惟每周的主麻礼及肉孜、古尔邦两个节日礼拜不能在家和其他地方，必须要在清真寺履行。为此，从喀拉汗朝统治者信仰伊斯兰教开始，就大量地建造伊斯兰教清真寺，开办宗教学校，培养传教骨干，增加大量瓦克夫地，以其作为传播和普及伊斯兰教的主要措施，特别是重视清真寺的建筑，以表示他们对于信仰伊斯兰教的虔诚。清真寺的建筑，根据人口聚居和宗教活动需要等情况，分为主麻清真寺、聚礼清真寺、麻扎清真寺、居民清真寺和路旁清真寺（供行人礼拜时用的简易寺）等。所以1102—1130年西部喀拉汗朝戴有阿尔斯兰称号的穆罕默德·本·苏米曼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以大事修建伊斯兰教建筑物而著名于世，他于公元1119年在舍姆斯阿巴德宫废墟上修建了一座大清真寺；公元1121年又在撒马尔罕修建了富丽堂皇的大清真寺；1127年还以自己出钱为名，在布哈拉修建了一座清真寺高塔，都各具风格，至今巍然屹立。这一时期除了遍布各地的清真寺外，还包括“为圣战而死的英雄们”建造的各种陵墓，俗称“麻扎”。

由于喀拉汗王朝时期已普遍用砖，使得清真寺和陵墓的建筑显得宏伟壮丽。从喀拉汗朝开始的维吾尔族的伊斯兰教建筑物不是以麦加克尔白寺院为楷模的平房建筑，而是仿照地中海沿岸形成的后期伊斯兰教建筑物的样式，具有厚实拱形正门和木柱回廊的内院式清真寺，主体建筑物多采用圆顶形式，在其复面上还采用各种几何图案和植物图案的凹凸瓷砖或彩色瓷片。如“布哈拉附近哈扎拉村的迪伽隆清真寺的主体建筑是一个立方式，其圆顶建在四根立柱之上，两侧的通道上盖着独特的圆顶。布哈拉的马戈克——伊·阿塔里清真寺别具一格。它有六根圆柱，十二个圆拱和高大的正门。可知喀拉汗王朝时期兴建的一些清真寺，显示了维吾尔族建筑师们的高度技艺和审美力。

现在我们走进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地区，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最显著的标志之一就是圆顶形式为特征的辉煌的清真寺。自喀拉汗朝以后的维吾尔族各级统治者无其不大肆修建清真寺，以表示对伊斯兰教信仰的虔诚，作为笼络人民的重要手段之一。中最卖力的更要算从1865—1877年统治新疆的阿古柏反动政权了，他在英俄帝国主义的扶持下窃取统治权后，就大力修建清真寺、麻扎。现在维吾尔地区最著名的喀什市的艾提卡大清真寺，虽然最早开始于伊斯兰历846年（1442）在此修建一座小清真寺，后又经过多次修建和扩充，但都没有象现在的规模，直到1865年阿古柏窃取权力后，才于1872年（伊斯兰历1296年）令其亲信阿里达德华西负责，才扩建成为总面积达16800平方米，南北长140米，东西宽120米，约合25.22亩的全疆最大的清真寺；而著名的莎车加曼礼拜寺、和田加曼礼拜寺也是阿古柏兴建和修复的。

既然清真寺是封建统治阶级用以笼络人心、禁固思想、麻痹斗志的重要活动场所。因此，凡是统治者和封建地主阶级都竞相修建清真寺，权势越大，修的清真寺就越大、越辉煌，在农村中的农奴主、地主所修清真寺基本都在其住屋近处，一般凡有清真寺处，即有地主、观其清真寺的大小，即可判断其权势的大小和财富的多少。

本来穆罕默德创立的伊斯兰教规定，严禁安拉以外的一切崇拜。为此，穆罕默德通